

第一章 从秀才到博士

一、石塘翁氏

公元 1889 年 7 月 26 日，即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六月二十九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石塘镇一个亦农亦商的士绅家族。

鄞县位于浙江东部，介于慈溪、镇海、定海、奉化、余姚之间，其地形东西宽南北狭，左右崇山环抱，蜿蜒磅礴，绵亘不绝，地势西部稍高，中部平坦，鄞江贯穿其间。这里江河密布，气候温和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阡陌纵横，稻田弥望，是个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鄞县也是个很古老悠久的历史，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夏有董子国，以赤董山为名，……加邑为鄞。”春秋之时，这里为越国属地，《国语·越语》中有“勾践之地，东至于鄞”的记载。秦始皇时正式于会稽郡下设鄞县（今奉化）。唐武德年间置鄞州，设置于鄞江、余姚江、奉化江汇合之处名三江口的地方，“大历年移鄞治于此，至五代始，州县合治，而鄞亦改鄞”。^①鄞县原属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府为宁波府，鄞县为其附郭县，即鄞县县衙与宁波府衙同在一城，一直相沿至清。宁波简称甬，故鄞江又名甬江。此处三江交汇，东临大海，港阔水深，海上又有舟山群岛以为屏障，是理想的天然良港，唐宋以来便为历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军港和造船业中心。城西南有四明山，古名句余山，西连余姚，南接天台，周围达 800 里，有 280 峰，中顶 5 峰，状

如莲花，上有方石，四周如窗，故称四明。城内有天童寺，规模浩大，为江南罕见，号称“天下禅宗五山第二”，为佛教禅宗胜地。有天封塔，始建于唐武则天天册万岁至万岁登封年间，高 18 丈，明 7 层，暗 7 层，传说地下尚有 4 层。城东南约 15 公里处有湖，名东钱，湖面广大，白波浩淼，山明水秀，风景如绘。明代著名学者范钦有诗曰：“澄波四望空，画舸泝冷风。野寺轻鸥外，人家细雨中。菰蒲临水映，洞壑与天通。即拟寻真去，桃源杳无穷。”^②

宁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宁波人自古具有强烈的进取冒险精神，地狭人稠的自然环境，又造就他们游食四方的经商习惯。明清之际，宁波商人即已相当活跃，被称为“宁波帮”。1842 年，宁波成为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悠久的商业传统，使宁波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海市场上的进口洋货生意，数十年间几乎为宁波人独占。

宁波城往西不远便是翁文灏的家乡石塘镇。翁家是个传统的绅商家族，相传其远祖在宋代时曾任明州观察，《宋史》有传。另有一种传说，其先祖元末之时从军，随军由福建迁此，后弃军从农，留居此处，繁衍生息。除此之外，翁家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族渊源，也没有传播久远的家传族谱。一直到了近代，翁家经营商业的特长才逐渐显露，也因而富裕发达起来。

翁文灏的高祖父翁开明（乾隆五十一年至咸丰三年，公元 1786—1853 年）凭藉一生的勤俭和精明，为子孙们留下了裕丰造酒坊（设在家乡）和裕大酱园、酒米铺（设在上海）等颇为可观的家业。到了翁文灏的曾祖父翁景和时，翁家的商业经营达到最高峰。

翁景和（道光三年至光绪三年，公元 1823—1877 年）字世昌，学名作霖，号梅臣，是翁开明的独子。他尤善经商，不但继承了家业，并且不断使之“发扬光大”，相继在上海开设长丰绸庄和大丰洋布店——经营进口洋布生意；在杭州开设打锡箔厂；在瞿州设上和南货店；在天津设乌木作坊；在宁波设宝大北船号、宝凤银楼；在本

乡有养鱼塘、农场、果园及祖传的裕丰造酒坊，积资达 200 余万。其中，大丰洋布店曾在上海近代洋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丰洋布店算得上是上海滩的老字号。1840 年前上海洋布进口尚少，1842 年开埠以后，洋货大批涌入，其中一种重要的商品就是洋布。棉纺织业原本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创业先锋，到了 19 世纪初，英国已是世界上棉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国家。4 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无疑是英国资本家看中的肥肉。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但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和厚实耐用的中国土布面前，外表美观均匀的机织洋布，“只有以低于中国土布的价格出售才能找到主顾”。^③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生产物的便宜与变革了的运输方法、交通方法……是征服外国市场的武器。”^④由于洋布生意有利可图，19 世纪 50 年代，上海县城和租界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推销洋布呢绒的“洋布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1853 年在南京路一带开设的大丰、增泰、恒兴、成德丰等洋布店和同年在在大东外开设的时和洋布店等”。^⑤

大丰洋布店最初是作为门市零售店出现的，设在南京路、河南路的转角处，资本只有 3000 元（两），规模并不大，每天零售额约有五六十元，忙时也不过百余元。大丰最初为翁家独资所开，故又被称为“翁大丰”。但翁家的人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经营，而是聘请“世家子”湖州人许春荣为经理，全权负责上海的门面。由于许春荣头脑灵活，长袖善舞，大丰的生意蒸蒸日上。

1860 年《天津条约》签订后，长江及北方各口岸被迫开放。上海以其优越的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开埠较早的历史，成为长江和北方各省进出口的集散中心。各地洋布商号纷纷到上海采购，但因资本薄弱，无力经营进口，只有向经销洋布的上海零售店批购。洋布销路的迅速扩大，使得上海一些原来以门市零售为主的洋布店，都转而向原件批发发展，成为“原件批发字号”。大丰也“将门市收

歇，租赁南京路同吉里五上五下楼房，改为原件批发字号’。^⑥

70年代以后，由于电报的广泛使用和汇率的波动，上海的洋行逐渐推行‘订货制度’，即商号先与洋行签订合同，预先订购，再由洋行按合同到国外订购，原件批发字号发展成为“订货批发字号”。大丰是向与其有长久供货关系的英商泰和洋行（Reiss Brother & co.）订购兰团龙牌漂布。由于经营得法，销路通畅，深得泰和洋行重视，于是兰团龙牌漂布改为由大丰独家包销，“由大丰和洋行订立契约，每年包销若干数量，如销路畅旺，可自行提高售价，且无同业竞争之虑”。“大丰包牌的兰团龙牌漂布、花蝴蝶尺、上绒等，售价一般高过同等质量的商品二钱五分或每码二分五厘”。“大丰的销售对象为北帮、天津帮、祥帮等，每年可获利10万两左右。据说北地消费者非兰团龙漂布不买，北帮办庄以办不到兰团龙漂布为憾。在棉布交易上，一般是跑街迁就客帮，而大丰的兰团龙漂布，因有与洋行的包牌子关系，反是客帮迁就跑帮”。^⑦翁家财源广进，经理许春荣也成为上海滩颇为显赫的人物，除向清廷捐有候补道台衔外，还兼为上海商务总会（总董事会前身）议董，又为德法银行买办、振华堂洋布公所总董。此时堪称是石塘翁氏家族的鼎盛时期。

宁波不仅以商业闻名宇内，同样以学术誉满天下，被称为浙东文化的代表，素有‘人文渊薮’之称。宋元之际，浙东书院就极为兴盛，科举也颇兴旺，父子同科、兄弟同榜中试者不绝于书，号称‘文物之邦’。明代时有人作过统计，结论是宁波是全国科举最繁盛的地区之一。宁波那林立的藏书楼，也可多少反映出当年此地的读书盛况，其中最著名的‘天一阁’，几乎是天下读书人憧憬向往的一片圣地。自古江南多才子，而宁波更是人才荟萃。明清之际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及全祖望等人，均名重天下，被视为宁波人的自豪。翁景和在精心致力于积聚财富的同时，并没忘记督促他的儿子们倾心向学，投身科举仕途。

翁景和生有四子 长子运高,次子运文,三子运炽,四子运新。翁运高(1839—1889)字南山,榜名步云,号梯青,才华卓著,雅擅诗文,为当时宁波名士。运高初为宁波府鄞县县学附生,后于同治三年以副贡生获补咸丰五年正科中试第六十一名举人,授内阁中书。

按清代制度,“会试落第举人,可因获中副榜授职。其中明通榜者以教职即用,亦有以主事、知县试用者;其中中正榜者以中书、国子监学正录用。”^⑧翁运高大约即因会试中正榜而得授内阁中书之职。内阁中书在清廷机构中属内阁的办事人员,虽只是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可谓‘身居要津’。

翁运高有两子,长子翁传洙,字宝森,号勉甫 次子翁传泗,字宝堃,号厚甫。传洙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传泗生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兄弟二人只相差一岁,形影相随,戏嬉互乐,在父母的娇爱之下自由成长,对西方格致新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八股文章、科举仕途。翁运高去世之时,兄弟二人只有十六七岁,失去了父亲的依凭和教导,更加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兴趣。翁传洙兴趣广泛,绘画、音乐无一不好,时常翻阅格致新书,兴之所至,尝购一洋式小火轮,自己开往上海游玩,玩厌倦了便不取分文地送给朋友。翁传泗‘好骑射,春秋佳日,携鹰犬驰逐东湖上,意气自豪’。且有好散财济贫的美名,故‘呼门就乞者,日常十数辈’,他‘每闻扣门声必躬后视,所予辄溢其人之望’。^⑨据说他还曾秘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宁波炮台司令。

翁文灏乃翁传洙之子,谱名存璋,字永年,文灏是他的学名,以后又自号詠霓、慙士。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翁运高已于半年前去世。虽然此时翁家已不似翁景和时代那般昌盛繁荣,但毕竟是宁波有名富户。据丁文江说,“翁文灏祖父死的时候,他父亲分得二十万两银子,上海还有一所铺子,每年有好几千收入”,他‘早年的环境是一个十足的纨绔’。^⑩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却没有沾染一点纨绔子弟的恶习,确实难能可贵。

幼年的翁文灏颇受祖母的宠爱，一来因为他是翁家的长房长孙，而且自幼聪慧可爱，其次也是因为他 6 岁丧母，‘幼龄失恃’的特殊经历。

翁文灏的生母余宝玉（1872—1895）是慈溪人，家中世代在上海经商，与翁家祖上即有姻亲关系。翁文灏幼时常随母亲到外婆家游玩，“水从石出真清澈，步逐坡登见曲斜”的乡间美景，给他留下极深印象。因夫妻不睦，在翁文灏刚刚度过 6 周岁生日的时候，余氏夫人便抛下翁文灏和他仅有两岁的妹妹翁杏仙，撒手人寰。幼年丧母对一个刚满 6 岁、对人生世事似懂非懂的孩子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多亏祖母的爱护照顾，才使他们没有感到太多的凄凉。一年多后，继母叶氏夫人来到翁家。

叶氏夫人名秀芬（1872—1932），也是慈溪人，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虽然处于继母——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悲剧色彩的社会角色，但她以一个女性特有的善良贤淑，视翁文灏兄妹如己出，并且教导督促翁文灏勤学苦读，力求上进，使这一双幼小心灵所受的创伤，得到了慰藉。叶氏夫人不仅为人贤惠，而且思想先进，据说她是宁波第一个提倡放足的妇女。在此后的 30 多年中，翁文灏视继母如生母，细心照顾，赡养终生，竭尽人子之孝，也算报答了这位含辛茹苦有养教之恩的继母。

也就在 6 岁这一年，翁文灏开始“入塾就读”。启蒙老师叫胡谿堂。当时私塾所读一般是《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圣谕广训》之类。1899 年，因石塘家中遭匪抢劫，翁文灏全家被迫避至宁波江北岸引仙桥，租屋而居。他的塾师也改为史隽德。1901 年，翁家再迁居宁波城里天封寺前三角地。

当时的中国，甲午战败使社会各阶层受到强烈的刺激，国内人心思变，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倡议革新，孙中山等立誓结盟，号召革命。1898 年的戊戌变法又以谭嗣同等人被推上祭坛而告终。

翁文灏就在这样优裕的家庭环境和充满忧患的社会环境中长大。

二、少年秀才

从 1902 年起，翁文灏师从何敏恭，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命令科举考试中“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尽管变法失败，但这一条却保存了下来。因为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翁文灏学习的重点放在了练习作文上。他的姨表兄李思浩在这方面给了他很多帮助。

1902 年，年仅 13 岁的翁文灏初次应试，即得名列鄞县县学附生，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秀才。县知事黄大华视翁文灏为奇才，甚为爱护，曾将其母所著《焚余诗稿》相赠。翁传洙喜出望外，手牵雀顶蓝衫的翁文灏访亲见友，着实地风光了一番。翁文灏也由此“略知清代科举之风尚”。^⑩在祖母和父母亲的陪伴下，第二年秋天翁文灏又赴杭州参加乡试。毕竟年龄尚小，结果翁文灏名落孙山，表兄李思浩、李思翰兄弟同榜登科，列名举人。翁文灏只好再等三年以后的下一次。

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十二月，翁文灏在祖母和父母的安排下，“依旧习成婚礼”。新娘是本县王家墩林贤生的长女，名叫林韵秋。林韵秋生于光绪十三年九月三日（1887 年 10 月 19 日），长翁文灏两岁。她为人宽厚，略通文字，在以后与翁文灏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始终相敬如宾，侍奉公婆，相夫教子，从不参与外事，是个典型的旧式贤妻良母。

新婚之后的翁文灏依然埋头读书，而且“作文颇有进境”，这时他的老师是应廷燮。就在翁文灏埋头读书准备应试之时，清廷再度颁行“新政”，其中的一条就是：“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

停止。”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寿终正寝。

清政府的这一改革，曾经令多少旧式学子涕泪长流，呼天号地，因为这样就断了他们进身仕途的唯一门路。但是年轻的翁文灏似乎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旧式的学校、科举停了，那就上新式的洋学堂。就在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的第二年，翁文灏考入了新成立不久的新式洋学堂——上海震旦学院。

三、“震旦三文”

震旦学院的创办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马相伯。马相伯，名良，字相伯。马家是丹阳的大户，世代信奉天主教。马相伯早年毕业于天主教耶稣会的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曾学神学，授职司铎，后脱离神职，投身洋务运动，欲图以实业救国。甲午战败后，马相伯“慨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有意兴办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⑫“1903年，南洋公学教习蔡子民（名元培）等会同学生数人访马相伯于土山湾，请设立学校，以宏造就。马相伯遂商请徐家汇耶稣会，就土山湾天文台旧址成立学校，命名震旦学院”，^⑬江南教会以马相伯所捐“学田”拨充基金。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取名震旦，是因为“震”即“秦”之谐音，为中国古称；“旦”为早晨；“震旦”意即“中国的曙光”。

1903年3月1日（一说2月27日）震旦学院开学上课，马相伯亲自教课外，还聘请一些法国传教士任教。最初学生仅20余人，至1904年初，学生增至百余人，马相伯请安徽传教司铎南从周（Perrin）任教务长，自任总教习。南从周到校后，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延长学习年限（原定两年），取消孔子诞辰假期并征收学生费用，因而与学生发生冲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闻而大哗，20多人（包括邵力子、于右任等在内）摘下校牌，集体离校。马相伯率领

离校学生另外创办了复旦公学。后在张謇、李平书、姚子让等人联络倡议下,震旦重行恢复;公推李问渔司铎为主持人(总教习),仍以南从周为教务长,于 1905 年重行开课,仍称震旦学院”。^⑭

震旦学院初期只设致知一科,后逐渐增添拉丁文、英文、法文及其他学科。课程分为致知(哲学)、象数、形性(包括理化、博物、地质)等。李问渔、南从周主持校务时,学校设两部分;以西国普通学校课程为预科,以中等学校及高等学校程度为本科,以立能入大学之基础”。^⑮第一年用中文上课;第二年使学生习惯于听用法文讲的课程;第三年起全部课程都用法文讲授。所授课程有法文、英文、文学、中外史地、哲学、经济、法学、算学、物理、博物等,第四年分文理两科。

翁文灏入震旦学院之时,正值改组后不久。据他后来回忆:当时震旦“功课特重法文及数学,并以余暇习史地、理化及英文,也略授哲学。”^⑯震旦的制度大都仿效法国的学校,考试制度极严。有周考制度,即每周六轮流考试一门功课。每学期举行两次月考和学期结束考试,到年终举行年考。从二年级起,除中国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法语教授,即便是中国籍教师也都讲法语。评分采用 20 分制,11 分以上为及格,一般满分只有 18 分,19 分的很少,20 分的根本没有。然而翁文灏这个小秀才,以其聪慧的头脑,刻苦的毅力,总是考得最好的成绩,和他的同窗胡文耀、孙文耀,被人称为“震旦三文”。

上海洋学堂的生活使翁文灏的眼界大开,他在四书五经诗文策论之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梁启超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使他热血沸腾,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又让他如坐针毡。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有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难道就只有被西方列强瓜分这一条道路吗?“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⑰可以说就在这时,翁文灏确定了救国报国的志向。1908 年,他以极优的成绩读完了两年预科。这一年的秋天,浙江省在杭州

举行第一次官费留学考试，翁文灏同胡文耀、孙文耀结伴前往投考。³人全部通过，获得官费留欧资格，其中翁文灏还获得第 7 名的好成绩。

四、官费留学

近代浙江开风气较早，青年出洋留学的历史较长，留学生的人数也较各省为多。早期浙江学生几乎全部留日，而且造就了许多革命人才，如徐锡麟、秋瑾等。清政府对此颇为恐惧，于是转而图谋将学生派往欧美，学习自然科学。“1907 年以后，在新闻报导中出现两个引人瞩目的新迹象：一是派往日本留学和已在日本留学的人中，有些人公开要求改往欧美留学；二是报刊上有许多文章介绍欧美各国的情形。……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收缩留日政策所促成，另一方面又与欧美各国乘机对中国留学生加强吸引有关。”^⑩

浙江省官费派遣学生留欧的设想，最早出自浙江旅沪学会。这个学会是在上海的浙江籍知识分子组织。1907 年，旅沪学会通过其会董汤寿潜向浙江省巡抚增韫建议：由浙江官费派遣浙江籍子弟赴欧美学习理工诸科。增韫最后同意在盐斤加价项下，每年拨出 3 万两银子，期限 5 年，派遣 20 名浙江籍学子赴欧美留学。

旅沪学会为此事多次举行会议，商讨如何考选，以杜绝以往欧美留学生成绩不佳之弊。他们认为，以往留欧美学生成绩不显著的原因有三：1. 由官方指派学生多为官绅士弟，滥竽充数，一到国外，游荡不安，一无所成；2. 留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一些人即使到国外留学也无法听讲；3. 不经严格考试，本国文字不通，易养成洋奴，为列强作帮凶。针对以上种种流弊，他们提出三项对应政策：1. 经严格考试，杜绝广遣私人虚占学额，（否则）不但贻笑外人，抑为国

人所痛心疾首；2. 选派欧美留学生宜采取公开招考办法，应考者不拘是否毕业，有无文凭，由各中学堂以上之学校，遴选浙籍品学兼优的学生，定期在省城举行考试；3. 考试科目应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包括英、法、德文），其中除国文一科外，均以外国语出题，应试者以外国语回答，但首先重视国文，有根底者方得入选。

不久，杭州、上海两地同时刊登广告，公开招考浙江籍留欧美学生 20 名。不数日，报名者即达 500 余名。6 月，考生群聚杭州。考试由提学使支恒荣主持，借杭州府中学堂举行，实际到场应考者有 200 人左右。

第一天首试国文，考试的题目是“礼失而求诸野论”。一些考生根本不知“礼失而求诸野”此言出自何处，只好望文生意，胡乱写来，结果文不对题，文理不通者极多。对于自幼熟读经史的翁文灏来说，这并非难题，他清楚地记得，这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孔子的一句话，原意是说，上古的制度礼仪湮没失传了，但可以从民间现存的活动、礼仪中寻到它的遗迹。按当时考试的规定，实行一次淘汰制，即上一场未通过者，立即取消继续参赛资格，不能再参加下一场的考试。第二日考数学，第三日考物理、化学，第四日考历史、地理，第五日考外语，英、法、德语任选一门。考卷均用外文出题，外文答卷，阅卷工作由旅沪学会所聘复旦大学教务长、著名学者李登辉等四名“襄校师”负责。从第二天开始，每日因成绩太差被取消资格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7 门考试全部结束后，提学使支恒荣张榜公布结果，最后共录取 20 名，另取 4 名以为候补。^④翁文灏一路过关斩将，最后以第 7 名的成绩与胡文耀、孙文耀同登“金榜”；而且震旦报名参试者也仅此 3 人高中。翁文灏高兴程度不亚于当年中秀才的喜悦。19 岁的他就要远渡重洋，去看一看西边的世界了。

赴欧留学的浙江籍学生，当年即由李芸孙率领放船出洋，与翁

文灏同行的还有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的徐新六、江苏铁路学堂的钱宝琮等人。他们由此相识，并结下了终生的友谊。船至欧洲，大家各奔东西，徐新六、钱宝琮赴英，翁文灏与胡文耀、孙文耀一同前往比利时。

五、鲁汶博士

近代中国学生赴比留学，最初是由湖北总督端方发起的。端方了解到比利时教育发达，“路矿之学尤为他国推许”，且“学费较省”，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请准派学生赴比留学，折中有这样的话：“中国地大物博，实甲环球，惟于工艺素少讲求。器械未能自制，开矿修路等事，无不雇佣洋匠，以致事权旁假，大利难兴。……比国实业较精，学费较省，诚能各派学生前往肄业，他日学成而归，上足以备任用，下足以裕资生，实于大局不无裨益。”^②次年，驻比利时大臣杨晟与比利时“外部、文部两大臣悉心会议”，商定中国学生“自初年以逮有成凡若干年”，各种学费、生活费等“每生需比银岁一千六百法郎”，较以往廉至三分之一。于是奏请飭令各省广遣学生赴比，学习路矿、制造各科，并拟定章程 12 条。杨最的奏折蒙获朱批恩准，此后赴比留学的中国学生方日渐增多。

1909 年翁文灏考入比利时的鲁汶大学。

鲁汶大学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东约 25 公里的鲁汶城。是欧洲最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大学。鲁汶（Louvain，或译为罗文、鲁凡、勒芬、卢万）属于布拉班特省，15 世纪时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经教皇马丁五世批准，1426 年布拉班特公爵吉恩四世仿效巴黎大学的模式，建立了这座比利时第一所大学。建立之初，鲁汶大学就以天主教研究中心而享有盛名。16 世纪，它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中心。法国大革命使该校于 1797 年关闭。1834 年比利

时主教团重建该校，使之成为一所用法语授课的天主教大学。鲁汶城也因大学的存在，而成为欧洲著名的大学城和文化中心。

据说，1425年教皇马丁五世批准成立这所大学的时候，有关方面最初考虑把校址定在布鲁塞尔，但布鲁塞尔城当局却坚决予以拒绝，理由很严肃，今天看来却很荒唐：怕因此玷污布鲁塞尔妇女的贞洁。鲁汶城却将位于市中心的最重要的贸易场所——“布楼”让给学校。这个颇有远见的行动使鲁汶获益匪浅。到20世纪初的时候，鲁汶大学的各类学院、研究所遍布大街小巷，与城市浑然一体，俨然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鲁汶还是一座有名的啤酒城，书和啤酒是这座城市的象征。今天，我们可以在学校总部（布楼）的广场上看到，有一座左手拿着打开的书、握着啤酒杯的右手高举过头顶做头顶浇灌状的学生塑像，他就是这座城市的象征。

鲁汶大学热情欢迎翁文灏这位来自东方古国的学子。翁文灏选择了地质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正式开始了远离祖国的留学生活。为何选择学习地质？翁文灏自己从未做过解释，别人也没有问过，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个选择给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利时当时的大学学制分AB两种，授课肄业的时间都是4年，所不同的是，如要获得博士学位，A制要另加一年，而B制则不需要。B制虽然时间较A制少一年，但课程及难度并不因此而稍有简易。翁文灏选择了时间短的B制。

翁文灏在鲁汶大学受业的地质学教师主要有：教地质学和构造地质的系主任多尔罗托（de Dorlodot），教结晶学、矿物学和岩石学的盖生（Kaisin）教授，以及教生物学和古植物学的副教授沙莱（Salie），教矿床学的副教授岛洛（Taurean）等。

在鲁汶求学期间，翁文灏第一年暑假曾往法国、英国游历，饱览异国风情；第二年暑假，又由西伯利亚铁路横穿欧亚大陆，然后经南满铁路，再乘坐大连至上海的航轮回乡探亲。据说他这次回国的主要原因，是筹措继续求学的款项。不知为什么，浙江省的官

费来源断绝，留学生涯面临半途而废的危险。然而，此时的翁家已非昔时可比，父亲对翁文灏的留学似乎也失去以前的热情。靠着妻子默默地卖掉了陪嫁的首饰，翁文灏才得以回到欧洲，继续他那未完成的学业。

1911 年，翁文灏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候选学位，即攻读博士学位资格。此后，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地质学的野外考察和室内显微镜下的研究，第三年暑假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到比利时各地进行地质旅行，考察地质和煤田构造，并为博士论文做岩石标本搜集工作。在盖生教授的指导下，翁文灏把博士论文的方向定在了对比利时火成岩石的分析，这是个以往极少有人问津的题目。比利时地质绝大多数为水成岩层，火成侵入岩只有葛纳（Guensst）与勒辛（Lessines）两处，因两处的性质相同，翁文灏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勒辛。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对所采集岩石标本认真的室内显微镜下研究，翁文灏用法文写出他的博士论文：《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共 28 页，后附有显微镜照片 3 张。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地质学博士论文。

翁文灏认为，勒辛地区玢岩的周围为寒武纪地层，在岩体中发育有一组平行的缓倾节理，倾向 $S \rightarrow SW$ ，倾角 $20-40$ 度。岩石的结构构造及矿物成分均有变化。他记录分析了根据肉眼观察和显微镜观察所看到的岩石的形态结构和矿物成分，认为：根据岩石的结构构造和矿物成分，岩石以定名为含石英玢岩为宜，属含辉石的玢岩类。

他记录分析了岩石的蚀变情况，并得出结论：“蚀变矿物研究表明，同一种矿物可蚀变为不同的矿物，而非常不同的矿物却可蚀变为类似的矿物。”“在蚀变过程中，岩石化学成分中铝镁和钾变化不大，而钙、铁特别是钠有降低的趋势。”论文中，翁文灏进一步详细记录、分析了玢岩中所包含的形状，组成结构，包体中长石与玢岩中长石的异同、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以及酸性包体的成分、形

成的原因。他在最后还论及勒辛与葛纳地区玢岩的异同，认为：“两地玢岩本身的特点表明，两地岩石同属一类，但岩体中包体的研究说明，两地火成活动产生的条件则各不相同。”^①

由于比利时学者一向忽视对火成岩的研究，翁文灏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镜研方法有所发展”。他不仅理所当然地被授予以理学博士学位 *Doctouren Science (Minerale)*，^② 而且论文被列为最优等，在学校的地质专刊上发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1913 年在比利时的鲁汶城诞生了。

“实地探寻侦察细，镜光鉴别考研勤。非因绵力能新得，少有前工故出群。”^③半个世纪以后的一个青年节里，翁文灏回首青年时代的求学生活，不禁感慨系之。从他那谦虚的遣词中，我们仍可以体会到作者那一丝甜蜜的幸福和自豪。

在第四年的毕业考试之后，翁文灏从鲁汶移居布鲁塞尔，一边参观各种博物馆、图书馆，一边不断到各地做短期地质旅行。很多年后，翁文灏自诩且自豪地说：我所到之地只有没进过的剧院，没有没进过的图书馆。这时期他还特别注意有意识阅读 DeLannay 有关矿产的各种著述，因为他很清楚，“立国于世界，自己要有力量”，中国之所以受列强欺辱，就是因为国家没有实力，而国家力量的源泉“一靠人，二靠地，人要尽其力，地要尽其利，以人的力量去开发地的资源，而后国家始可发生力量”。^④

当时布鲁塞尔博物馆中展出的白垩纪禽龙化石，给翁文灏很深的印象。禽龙是中生代的独特产物，古生代尚未见到，新生代则已灭亡。翁文灏半个世纪以后，仍然念念不忘布鲁塞尔博物馆中的那副躯骨，因为正是从这里，他悟出：“生物演进在渐变之外，更有突变奇迹。”^⑤

留学期间发生的一件大事一直萦绕在翁文灏心头，催促着他快些回到天翻地覆的祖国。1911 年秋天，中国传来的消息震动了留欧的学子们：武昌爆发起义，全国响应。不久，孙中山从美洲返

国途经欧洲。据翁文灏记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尚在比，首悬新国旗志庆，并偕同学捐资于孙中山，俾其从早返回，领导革命。”在武昌起义胜败未定之际，“首悬新国旗志庆”不仅是翁文灏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且也是一次带有风险性的政治表态。因为他是官费留学，接受清政府驻欧官员的管理，如果武昌起义——这在革命党的历史上是 9 次失败后的第 10 次起义——失败，“首悬新国旗志庆”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罪名。但“其时青年人士莫不因政局之革新，盼国势之复振，期望甚殷”，^②澎湃的爱国热血涤荡了个人功利安危的顾忌。1913 年末，翁文灏离开了比利时，离开了欧洲，乘船沿来时的航线回返祖国。

关于翁文灏获得博士学位以及从欧洲回国的时间，过去的记载有许多矛盾之处，翁文灏自己后来的回忆也不完全准确。鲁汶大学保存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翁文灏是在 1913 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博士毕业考试初考，并于同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而非以往所记的 1912 年。^③如此，翁文灏回国日期当在 1913 年末而非 1912 年末。翁文灏回国以后的经历日程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比利时的留学生涯，使翁文灏接受了全面系统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训练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熏陶。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礼失而求诸野”，到勒辛旷野上的玢岩，以及布鲁塞尔博物馆里的白垩纪禽龙躯骨，翁文灏完成了由一个中国秀才到现代地质学博士的转变，准确地说不是转变，而是一个中国秀才与地质学博士的沟通。获有秀才功名而又得留洋博士学位，这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才具有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秀才、博士一身二任者鲜见，学贯中西者更属凤毛麟角，而东方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科学的通汇融合，在翁文灏的身上并没有丝毫突兀悖理，相反却让人觉得那么自然协调。他那用法文写成的博士论文里，闪烁着的是东方古老文明的智慧之光。

注释：

- ①②《鄞县通志》(民国)。
- ③《鄞县史志》1988年第1期。
- ④《北华捷报》1850年8月17日。
- ⑤《资本论》第1卷第549页。
- ⑥《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147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
- ⑦《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第24—25页,第62页。
- ⑧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第46—47页,中华书局。
- ⑨丁江《我所知道的翁咏霓》,《独立评论》第97号。
- ⑩⑪⑫翁文灏《年谱初稿》(未刊稿)。
- ⑬《马相伯笔录》,江苏镇江、丹阳市政协编《爱国老人马相伯》。
- ⑭⑮《震旦大学历史考证书》,上海档案馆Q244。
- ⑯《震旦学院简章》,《汇报》1905年8月12日。
- ⑰翁文灏《蕉园诗稿》。
- ⑱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第27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 ⑲沈畴民《记浙江第一次考选欧美留学生》,《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 ⑳《约章成案汇览》卷32下,《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二。
- ㉑《翁文灏选集》第1—2页,冶金工业出版社。
- ㉒⑳翁文灏《回溯吟》(手稿)。
- ㉓翁文灏《恸士诗稿》(未刊稿)。
- ㉔《翁文灏先生言论集》,上海友联书社1936年。
- ㉕Annaire L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 1914..